

西北人民军政大学前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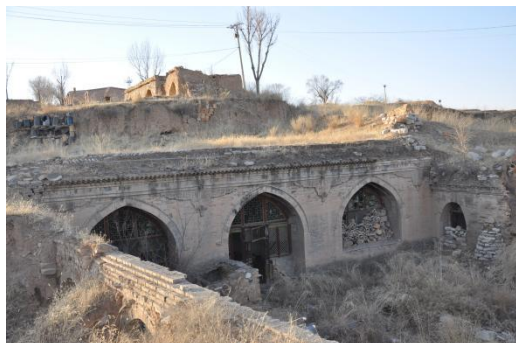
——贺龙中学三部峙峪旧址简介

贺龙中学是贺龙元帅亲手创办的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中等学校，目的是为解放军各部门培养初级军政干部，也为革命战争胜利后建国培养大批有理想、有知识的基层干部。始建于1945年9月2日，当时学校定名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贺龙亲任校长，派秘书彭德任副校长，筹备建校；又令时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的张宗逊将军、副政委的罗贵波将军，协助建校。按照抗大的军校模式和宗旨办学育人，大量培养新解放区及游击区的知识青年。学校先后设有贺中一部、二部、三部、贺中附小和地方干部培训班。学制半年，学生伙食费用全部由学校供给。

学校以解放后的文水县中学的学生为基础，在山西晋中地区招收一批学生后，于1945年10月迁移到山西吕梁地区方山县大武镇，1946年7月1日更名为“贺龙中学”，习惯上称为“一部”；此后贺龙将军又指示在山西忻州地区崞县（今原平）成立了“贺龙中学二部”，在山西雁北地区成立了“贺龙中学三部”，后来三部并入二部。

1945年冬，中共雁门区党委根据晋绥边区政府指示，在左云县成立了晋绥边区第五中学，校址在县城西南角原日军兵营，校长由五专署专员阎秀峰兼任，从延安来的郝笑天为第一副校长，原雁北行署民政处副处长、教育界知名人士王缮为副校长。这是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雁北西部成立的第一所新型中学，在当时困难条件下，以老解放区学校为模式，全校编有三个班：一个干部班、两个中学班。



1946年8月，因战局紧张，绥蒙一中部分师生在江淮同志带领下，撤离丰镇到左云与晋绥五中合并，归属晋绥军区领导。

1946年9月7日，学校奉命转移，大部分学员随学校经右玉南花园村、平鲁县井坪等地，于9月10日到达朔县峙峪村整训换装。天主堂、地主大院成为学校校址。不久，贺龙司令员派钟师统接管学校，正式宣布更名为贺龙中学三部。贺龙兼任校长，李井泉任政委、周士弟任副校长，钟师统任主任，郝笑天、王缮任副主任，岳根活等同志参与管理；教师大多数是来自大延安后

方的知识分子，并在抗大学习过，有的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全校师生一百五十余人。

到峙峪后除继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历史、音乐、体育等课程，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军事常识和队列训练。钟师统博古通今，讲课生动。他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让学生不死钻书本，而要理论联系实际，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实践中学习、锤炼，增长才干。他还教导学员们苦钻文化知识，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一点一滴积累知识。为了庆祝我军晋北、晋中、晋南战役的伟大胜利，学校组织了一次一百多人参加的大型宣传队到朔县城进行宣传活动，其中有男女生参加的秧歌队，演话剧，贴标语，十分活跃；因为朔县解放不久，群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宣传队，感到很新鲜，很惊奇，街上围观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宣传效果很好。此间，晋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杨尚高同志到峙峪给全体师生做过一次政治形势报告。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学习，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组织观念、军容风纪有了明显加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贺中师生奋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他们多数都成为党的中坚和革命队伍的栋梁。

1946年12月中旬，遵照晋绥军区和贺龙司令员指示，在钟师统率领下，贺龙中学三部从朔县峙峪出发，经厦阁、阳方口、宁武、东寨、头马营、分水岭、静乐等地到达岚县斜坡与贺龙中学二部合并。郝笑天、王缮被任命为贺龙中学二部副主任，贺龙

中学三部学员合并后编为二部第四队。至此，贺龙中学三部胜利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没有迁走的教师、学生和教学设备留在米昔马庄村（今新安庄）天主教堂大院，1949年3月15日，成立雁北第一所中学——雁北五中，校长由五专署专员李滋润兼任，教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杨克林，王缮任副校长，1949年11月奉专署指示改朔县师范，为晋北培养出大批干部和教育人才。学校后来发展为雁北师范朔州分院、大同大学朔州师范分校、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贺龙中学三部同贺龙中学二部合并，不仅扩大了学校的规模，使学员增至七百余人；而且带来一批文化素质高，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充实了机构，加强了各级领导，为进行正规的教育训练，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贺龙中学在办学三年中，有三千余名知识青年在校学习。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晋绥军区与西北野战军工作。

1948年8月，学校奉贺龙将军命令迁移至山西临汾市，同陕甘宁步兵学校合并成立“西北人民军政大学”，贺龙兼校长，李长路、钟师统任副校长，钟师统还兼党委书记、晋南区党委委员。

贺龙三中峙峪校区旧址依坡坐西朝东，南边为“安兵”的一个窄院，驻守保护学校的部队，可居高俯视周围情况。向北有一处四面为窑洞的大院，为教室，以上两处现在存有旧址；北边为学生宿舍、食堂，在危房改造时已推下坡，拆毁。

贺龙中学三部相关革命家在朔州和周边地区的战斗经历

贺 龙（1896.3.22—1969.6.9）
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县人，汉族。18岁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30岁时成为北伐名将，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1927年8月1日应谭平山策动，任“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脱离中国国民党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11月19日，率领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1936年6月30日，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历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等职。1937年9月28日，派358旅旅长张宗逊和政治部主任张平化率716团和旅直属队，辗转挺进洪涛山区，716团副团长宋时轮带领2营改编的雁北支队参加了雁门关伏击战、马鞍山伏击战、口子上阻击战等，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38年5月下旬，宋时轮带宋支队到达平西，即北京西部，与邓华建立八路军第4纵队，任司令员兼12支队司令员，邓华任政委，（1947年2月任华野第10纵队司令，创立战壕防御战范例，有“排炮不动、必是10纵”的说法。1950

年 11 月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指挥长津湖战役，在新兴里战斗中歼灭美军北极熊团，又称 7 师 31 团；指挥下碣隅里、古土里、水门桥战斗，痛击美 10 军陆战 1 师，此役歼灭美军 13916 人，俘虏 1031 人）。宋支队走后，贺龙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在同蒲铁路西建立独立六支队，刘华香为队长，李林为骑兵营教导员；在同蒲铁路东建立了雁北支队，刘苏为队长；与日寇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历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1946 年 6 月 17 日指挥了晋北战役解放朔县战斗，并亲临朔县、平鲁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1955 年授衔时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9 年 6 月 9 日病逝于 301 医院，享年 73 岁。

1974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

周士第（1900.9.9—1979.6.30）
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

192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第 1 营营长、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团长，第 25 师师长，八路军第 120 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华北军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等职。

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百团大战，指挥晋北战役，协助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参加“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挺进大西南，参与指挥扶郿战役和秦岭战役，连续解放汉中、广元、剑阁、江油、绵阳等40多座县城。参与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防空作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年6月30日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人。

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政治指导员、排长、连长，红军连长、副支队长、支队长、师长、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



晋西北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等职。

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井泉 出生于1909年11月1日，江西省临川人。

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红三十五师政委、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



1937年8月，任120师358旅副旅长兼政委，1937年10月3日，带领李支队袭击宁武，10月中旬，支援忻口会战。

1938年7月，任120师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旅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带领715团（团长王尚荣、二营营长唐金龙）、师部骑兵团一个排（独立六支队队长刘华香率领）、战动总会裴周玉及其领导的游击四支队，从朔县出发，在平鲁区窝窝会集结整训全部队伍2300余人后，北出绥远，挺进大青山，过平绥铁路，8—9月在绥中三战三捷，攻下陶林（今察右中旗），攻克乌兰花（今四子王旗），打蜈蚣坝伏击战，10月下旬解放包头；9—10月间，在绥西又取得三战三捷，打了后脑包阻击战，夜袭陶思浩火车站，智取石拐镇。与蒙汉骑兵游击队会合，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一年里消灭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建立绥蒙军区，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晋绥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任晋绥野战军政委；1946年春，任晋绥军区政委。

1948年9月晋察冀与晋绥边区部队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委。

1949年10月，与贺龙等带领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7军19师11700余人作为前锋，由陕西进入四川，进军大西南。首先，发起秦岭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加上陕南军区59军55师，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西北的任务，分川西北、川北和沿川陕公路三路穷追猛打，解放广元、攻克剑门关，夺取广汉、金堂、新都；12月30日，解放成都。与此同时，李井泉任“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后改为“西北入川工作团”）团长带领山西干部4800余人作为第二梯队从山西临汾出发，经西安、宝鸡，向秦岭进发，跨过大巴山，过陕南留坝、褒城，直到成都，负责成都和川西、川北、西康省的接管工作，每解放一地，就接管一处。随工作团出发的还有抗战时期担任过朔县县委书记的阎秀峰、雁北工委书记贾丕绩、芮城干部李定邦等人，解决贵州、四川、西康的国民党残余和土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历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授衔时李井泉已经到地方工作，因此没有参加授衔。

罗贵波（1907.7.14—1995.11.2）

曾用名李华文、罗心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57.10～1970.10）。江西赣州
南康潭口镇人。



1926年4月参加革命。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参加了红军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是赣南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40年，参加领导了百团大战，担任晋绥边区南线指挥。1949年9月至12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50年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

1953年9月，被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予胡志明金质勋章。1954年9月任驻越南首任大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年12月任山西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82年9月、1987年10月，两次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特邀出席中共十四大。

著有《革命回忆录》。

阎秀峰（1914—1983）又名阎伟，山西天镇人。

1933 年参加革命。1934 年被捕入狱。后在狱中相继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36 年 9 月出狱后，任中共河东工委书记、雁北工委书记、晋绥五专署专员、绥蒙人民政府副主席、晋南行署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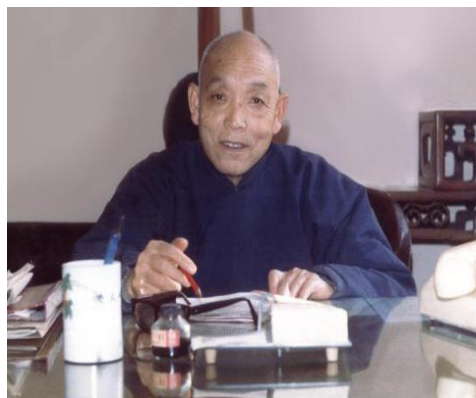
建国后，任川西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二副主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常委。

1983 年 11 月 28 日在北京病逝。



钟师统（1913—2001）1913 年 12 月 20 日出生，陕西省华县人。

少年时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长期从事部队教育工作，曾任西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四川省人大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6 年 9 月任贺龙中学三部主任，直接负责办学工作。

1948 年 8 月任西北人民军政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晋南区党委委员。

1953 年调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1979 年当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81 年被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体育学评议分组组长。

王 缮 (1902—1969), 字完如, 山西右玉人, 非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 全国的抗日怒潮风起云涌。1937 年春夏之交, 牺盟总会委派特派员屈健(抗日女英雄李林同志的丈夫, 抗战时期任中共平鲁县工委书记十一专署专员, 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村部副部长, 水电部农水局局长兼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康庄 (又名康子仲,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绥蒙区大同县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粮食厅副厅长等职) 两位共产党员来到山西平鲁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王缮便利用担任平鲁县政府科长的合法身份, 尽力掩护屈、康二人开展工作, 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提供便利。还特意安排屈、康二人到平鲁县第一高小任教, 以利用合法身份在教师及学生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发展牺盟会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全县参加牺盟会的猛增到三千余人, 仅第一高小和女子高小的学生参加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就有 100 多名。广大青壮年则纷纷参加抗日自卫队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敌人。以至后来回顾那段历史时, 屈健、康庄二人深有感触地说: “那时, 如果没有王缮校长的保护和支持, 我们很难在平鲁县立足, 平鲁县先于其它各县出现抗日高潮, 应给王缮校长记一大功”。



1945 年冬, 任晋绥边区第五中学副校长, 1946 年 9 月任贺龙中学三部副主任。

1947 年底, 任晋西北雁北中学副校长。

发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第一套弓箭的划时代创新之地

——朔州峙峪人遗址

28700 年前峙峪人（猎马人）遗址

生活在山西南、北两地的远古人类，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一般把山西南部的远古人类称作“河、汾之滨的拓荒者”；而把山西北部的阳高县许家窑人和朔州峙峪人称作“黑驼山下的猎马人”。总体来说，当时阳高县许家窑人和峙峪人生活的山西北部，不像南部那样主要适宜于采集，而是主要适宜于狩猎。所以，捕获奔跑的野马、野驴等动物便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根据这一特点，一般把他们称作“猎马人”，这和南部的“拓荒者”显然是不同的。并且，北部猎马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峙峪人时代达到了最高水平，可以说是猎马人的典型代表；而峙峪人集中生活于桑干河源头的黑驼山麓，所以便把以峙峪人为典型代表的猎马人称作“黑驼山下的猎马人”。

与北京周口店人同列旧石器时期“小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

峙峪人遗址位于大同盆地南端的朔州市峙峪村附近，峙峪村坐落在桑干河源头的黑驼山东麓。这里西、南、北三面被连绵的峻岭所环抱，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桑干河平原。峙峪人便生活在峙峪村附近的小丘上。他们属于两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

古人类。从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峙峪人和阳高县许家窑人大体上相同，而且有前后继承的关系。



峙峪遗址



猎马人捕获水牛

峙峪人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也主要是属于细小石器一类，包括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以及水晶小石刀和石墨钻孔器等等，这些细小石器，不但数量大、品种多、轻巧精致，而且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也比阳高县许家窑人有了明显的进步。

从峙峪发现的各种动物化石，可以说明当时的气候物产条件。

因为，其中既有野马、野驴、羊等草原动物，也有赤鹿、大角鹿等森林灌丛动物；既有适应于干冷气候的鸵鸟，也有喜好湿热的水牛。可知当时的冬夏两季温差很大，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很多。黑驼山东面的桑干河平原便是草原动物奔驰的广阔天地，深山峻岭则是森林灌丛动物出没的场所。



野马



野驴



羊



赤鹿



大角鹿



鸵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的各种动物中，数量最多的还是野马、野驴等草原动物。并且，这些动物的骨骼化石又往往是同残留的烟火灰烬和烧过的石块混杂在一起，有的还密集成堆。这里的动物牙齿化石，总共有 5000 余枚，其中野马牙齿化石的数量最大，有 4000 余枚，占 90% 以上。再就是野驴牙齿化石，经考古学家研究，这些牙齿化石至少代表了近 120 匹野马和 80 头野驴。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说明，当时的峙峪人是靠捕获草原动物来维持生存的，而且他们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野马和野驴。

华北地区的旧石器分为“大石器”和“小石器”两大系统。如果说小石器的开创者是五六十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那么，到十万年前的阳高县许家窑人则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再到两三万年前的峙峪人便趋于定型。所以，考古学家把北京人和峙峪人作为小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称作“北京—峙峪系”。因为考古学家把北京人遗址称作“周口店第 1 地点”，所以小石器系统的正式名称又叫“周口店第 1 地点——峙峪系”。这也再一次说明，峙峪人的生存环境虽然和阳高县许家窑人的大体上相同，但是，峙峪人制造和使用的细小石器工具都比阳高县许家窑人的进步很多，所以，他们作为华北地区小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人类的“第一套弓箭”与改进的“飞石索”

石镞就是古人类弓箭的箭头。在中国古人类历史上，峙峪人

最早制造了弓箭的箭头，发明了中国古人类的第一套弓箭。比欧洲公元前 1 世纪的用弩历史早 2.65 万年，恩格斯曾这样讲过：

“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箭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而这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便是峙峪人最早发明的。

峙峪人的石镞，是利用非常薄的石片加工制作而成的，石片上有一个很锋利的尖端，尖端两侧的边缘也都很锋利，底部比较窄，可以绑在木棍上组合成箭头。

弓箭是一种射程远、精确度高、命中率大、杀伤力强的狩猎武器，它既可以避免人与动物面对面搏斗的辛苦和危险，又能大大提高捕猎效率，捕获更大量的动物来食用。因此可以说，弓箭的发明乃是人类狩猎技术上的一次革命。对峙峪人生活的那种

“蒙昧时代”以猎获动物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古人类来说，弓箭自然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

最早的石镞



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出土的 28700 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镞，是至今发现最早的石镞。

石镞



弓箭



猎马人射杀水牛

峙峪人当时的生存环境并不优越，气候等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但是，峙峪人为了生存，为了保障食物的来源，他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去观察各种动物的生活状况，于是他们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野马、野驴这类草原动物身上，还逐步掌握了它们的生活规律，因而自觉地把捕获，甚至驯养野马、野驴等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就是说，他们从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又吸取以前的古人类，主要是阳高县许家窑人制造石球、使用“飞石索”捕获动物的技术经验，发明了用弓箭这种决定性的武器，这就使他们的劳动技能大大提高，也把当时的狩猎技术推到了新的高度。正是凭借这些，峙峪人能够在比较困难的生存环境下，创造出了比前人更加辉煌的文化成就。

他们制造和使用的石球，不但分为大、中、小三种不同的类

型，而且每种类型的体形都相对较小，最小的不足 100 克，最大的也不超过 1500 克，各种类型的石球又有各自不同的用途。大石球可能是用来远距离投掷的，是击伤动物的狩猎武器；中小石球便是制成前面所说的“飞石索”，用来远距离绊倒动物后加以捕获的。比起投掷武器的石球，飞石索便是相当进步的狩猎武器了。

飞石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股飞石索，长约六七十厘米，一头握在手中，另一头拴有石球，投掷的时候先用右臂将它旋转，然后投向狩猎目标，石球引索飞出便可击伤或打倒野兽。另一种双股飞石索也很常见，它的绳子长大概有 130 厘米左右，中间编一个凹兜用来盛放石球，使用的时候把飞石索两端握在手中，利用旋转的力量将石球抛出，这种飞石索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五、六十米甚至一百米。这种飞石索既可投掷单枚大石球，同时也可用来投掷数枚小石球。

峙峪人文化是阳高县许家窑人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发扬光大。其中一个最为闪亮的地方，就是峙峪人在阳高县许家窑人拿石球投掷击伤动物、用飞石索绊倒动物并加以捕获的经验中，进而研制出锋利的石镞，并安装成弓箭这种狩猎武器。很明显，比起石球和飞石索来，拿弓箭来捕获动物，射程更远、精确度更高、命中率更大、杀伤力也更强了，所以弓箭被称作蒙昧时代古人类的决定性武器。

峙峪人发明的弓箭，最初主要是一种决定性的狩猎工具，到

后来，弓箭不但用来狩猎，最主要的是将它用作战场上的武器。到了青铜时代，由于铜器和铁器的出现，弓箭的箭头便由石镞变成铜镞、铁镞了，并成为几千年来最具有杀伤力的战争武器。

峙峪人制造和使用了大量高水平细小石器工具，由此而成为华北小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不仅他们的狩猎生活能显示“猎马人”的本色，而且，他们最为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弓箭，这是中国远古人类的第一支弓箭，是“蒙昧时代”具有决定性的武器。因而，峙峪人与北京周口店人并列为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小石器系统的“璀璨明珠”。

中国最古老的水晶斧形小石刀

水晶小石刀，是用半透明的水晶做原料加工制成的斧形小石刀，特别精致、小巧、美观，可以安装在木质或骨质的柄把上当斧子使用。当时能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难得的。经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从来还没有发现过类似这样的石器。可见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水晶制品。



水晶小石刀

中国最古老的石墨钻孔项链坠子

出土的石墨钻孔器，是以石墨为原料，经过磨制加工，并从

一面钻出圆孔的器物。从这里不但看出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对石器进行磨制和钻孔的技术，还意味着以打制技术为标志的旧石器时代将要过去，以磨制技术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就要来临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种器物大概是峙峪人用来做装饰品的，说明这个时代，人们也开始装饰自己以追求美观。



石磨装饰品

中国最古老的石锯

出土的齿状石锯是用来锯开木头，或石头的，是后世鲁班锯的铁器锯条原型，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锯。



石锯



古楼烦国骑兵

考古发掘工作是厦门大学开展的 ,所有出土文物都在厦门大学馆藏。

资料来源：

《山西文明史》上卷 129-137，杨茂林等著，2015 年 5 月出版

三晋文化研究会 刘元

撰稿组人员：

祁贵、李广中、刘元、侯进祥、陈丽春、贾兴、白晓芳、刘志芳

峙峪村古村落民居

一、落家砖雕挂面房院



外观全貌



大门楼



门楼内顶部



大门石花地面



西正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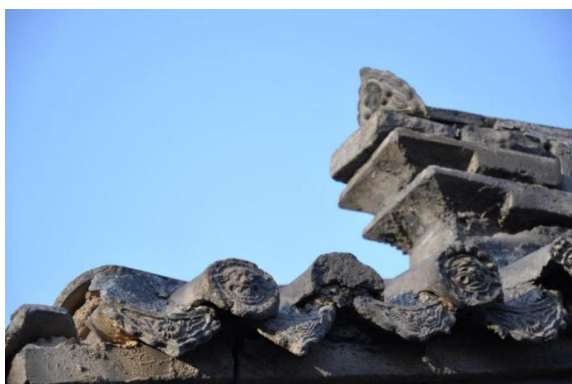
正房砖雕



正房和东房



东房飞椽



东房兽头瓦当猫头、滴水、马头



院内铺石头图案

二、青砖雕花门楼院



大门带耳房



耳房



大门洞上部砖雕



大门洞下部砖雕



西房和正房

三、辽代卷脊砖瓦房



侧面



前面



石子漫院图案

四、石砌墙房



后墙



屋内石片墙图案

五、石碓窑



东窑



东窑和中窑



中窑和西窑



石碓窑南窑